

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公祭所想

陳來元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七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通過決定，將十二月十三日設立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三日，我國第一次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舉行了國家公祭儀式。

南京大屠殺是二戰歷史上「三大慘案」之一，是一宗駭人聽聞的反人類罪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和中國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對此早有定性和定論，一批手上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日本戰犯受到了法律和正義的審判與懲懟，被永遠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但長期以來，日本右翼勢力對日軍在南京慘無人道地屠殺我國三十萬放下武器的軍人和手無寸鐵的平民的血腥罪行始終不肯承認，並惡意篡改歷史，為日本軍國主義在中國犯下的滔天罪行竭力塗脂抹粉，美化侵略戰爭。特別是近幾年來，日本右翼在事關拜鬼、奪島、擴軍、修憲等問題上變本加厲地不斷對我國進行挑釁。在此背景下，我國對南京大屠殺案立法設立國家公祭，並在國家層面高規格舉行公祭，緬懷慘遭日本侵略者殘害的死難同胞和為抗日而獻身的革命先烈，提醒人們牢記中華民族這段慘痛的歷史，時刻警惕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同時宣示中國人民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的崇高願望，有着十分重大和深遠的意義。國家公祭體現了國家和民族的意志，必能進一步凝聚全民族奮鬥向上的力量，早日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公祭是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舉行的，這使我聯想到了我曾在耶路撒冷參觀過的猶太大屠殺紀念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全世界有猶太人約一千二百萬，遭納粹屠殺的就有約六百萬。一九四五年，猶太人在英國倫敦舉行了二戰後第一次猶太復國主義大會，決定由巴勒斯坦猶太民族委員會來領導建立這一紀念館。這座紀念館是根據以色列國會通過的紀念法令，為永久紀念在二次大戰期間被屠殺的猶太人而建立的，於一九五三年初建成，一九九三年重建。

這座紀念館包括一座歷史博物館、一座檔案館、一座猶太教堂、一座死難兒童紀念館、一條畫廊、一間「姓名大廳」、一個教育中心以及與大屠殺有關的展廳等部分。該紀念館的任務和職能是：收集、保存大屠殺受害者的名字、關於大屠殺的照片、文件和倖存者的證詞；研究大屠殺歷史，出版英文和希伯來文的與大屠殺有關的書籍和期刊，向全世界提供有關大屠殺時期的信息和資料；經營「大屠殺學國際學校」；舉辦大屠殺展覽，進行關於大屠殺的公眾教育；舉辦紀念儀式，紀念大屠殺受害者；幫助國外司法機構審判戰犯等。大屠殺紀念館內內容豐富，資料翔實，是以色列對猶太人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生動課堂。

但這座紀念館同時也是以色列向國際社會揭露二戰期間納粹罪行和展示在歷史上猶太民族苦難的生動課堂。為此，凡是訪問以色列的外國高級代表團，以色列方面都要首先安排其參觀這座猶太大屠殺紀念館，然後再舉行會談會和其他活動。以色列方面的這一做法，收到了良好的宣傳效果。可以說，參觀者人人都對希特勒法西斯的滔天罪行十分憤慨，同時對猶太人的歷史苦難深表同情。據報道，喬治·布什擔任美國總統期間曾到訪以色列，在參觀大屠殺紀念館時流下了眼淚，並表示當時的美國政府應設法解救奧斯威辛集中營裡的猶太人，來阻止這場大屠殺。

對納粹的暴行，二戰後德國政府誠懇地懺悔，前總理勃蘭特在一九七〇年甚至向死難猶太人下跪謝罪。儘管如此，以色列仍堅持將猶太大屠殺紀念館作為一座教育、宣傳基地，用來揭露納粹的罪行和展示猶太人的民族苦難。而時至今日，日本右翼不但始終不能正確地對待歷史問題，並一味美化侵略戰爭性質，而且還不斷地向中國挑釁。有鑑於此，為使中日兩國人民更好地以史為鑒、面向未來，並使各國人民更加緊密地團結起來，共同為人類和平作出貢獻，我們是否可以也多少學一點以色列的做法呢？



顧

農

隱身雲霧

遊過大山的人都知道，繚繞在山腰和遠處的那些雲，其實就是霧氣——近處感覺是霧，遠看就是雲。易地而處，情況也是一樣。

古代的隱者喜歡躲入深山，避開世俗的紛擾，過一種半仙似的生活；當然仍然會有朋友來訪，並非完全遺世獨立，但要找到這樣的隱者卻不容易，事先完全無從聯繫，好不容易爬山爬到他的住處，很可能不在，不知道他雲遊何處；即使知道在哪裡，也很難找到或等到他。唐人賈島《七言八四三》有一首《尋隱者不遇》詩專寫這樣的情境，歷來傳誦：

松下問童子，言師採藥去。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

譬如，要會寫先要會讀，熟悉並內化書面語言的節奏是寫出好文的前提。但寫作本身又充滿了矛盾和蕪雜。和當代人對萬事有頭有尾、井井有條的期望相悖，寫作永不會終結。寫作的重頭是思考，但我們腦子所想和紙上所現往往截然不同。有時，寫作又顯得百無一用。寫作要全面徹底，但不可窮根究底；要結構嚴密，但有時最讓人難忘的作品卻是靈機一動的偶獲。最後，X教授從地下室發出的聲音提醒了我：高校可能是讓忘卻現實的象牙塔、「肥皂泡」，寫作則永遠是艱辛、孤獨、漫長的歷程。

象牙塔的地下室



X教授

當然這是筆名。二〇〇八年他曾在美國著名期刊《大西洋月報》(The Atlantic Monthly)上發表同名長篇散文，引起極大爭議。書中摘錄了作者收到的各色批評：歧視工人階級，教學水平低，懶惰，勢利，甚至是「領罪犯」的罵名。從書中描繪來看，他的確是個思維較為老派的老師。

引導學生分析美國文學時，他不願意觸及有關種族歧視的黑暗歷史。他不相信「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方法，認為專業知識過硬就能當個好教師。他還覺得學習是個放棄自尊、順從權威的歷程，並不贊同師生平等的調調。其實，只有學生本人擁有極大動力、精力和能力才可能在大學成功。

X教授因為在二〇〇七年經濟蕭條前剛買了新房不得不兼職，而在政府部門工作，晚上下了班再去兩所大學教夜校，一門課每學期約收入二千美元。書中描述他的打工作業時不免被個人經濟負擔重、家庭關係緊張的餘韻滲及。但作為一個資深作者，他對寫作的愉悅和艱辛也別有會心。

他也不相信「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方法，認為專業知識過硬就能當個好教師。他還覺得學習是個放棄自尊、順從權威的歷程，並不贊同師生平等的調調。其實，只有學生本人擁有極大動力、精力和能力才可能在大學成功。

譬如，要會寫先要會讀，熟悉並內化書面語言的節奏是寫出好文的

前提。但寫作本身又充滿了矛盾和蕪雜。和當代人對萬事有頭有尾、井

井有條的期望相悖，寫作永不會終結。寫作的重頭是思考，但我們腦子

所想和紙上所現往往截然不同。有時，寫作又顯得百無一用。寫作要全

面徹底，但不可窮根究底；要結構嚴密，但有時最讓人難忘的作品卻是靈機一動的偶獲。最後，X教授從地下室發出的聲音提醒了我：高校可能是讓忘卻現實的象牙塔、「肥皂泡」，寫作則永遠是艱辛、孤獨、漫長的歷程。

宥諒。」

她完全融入了香港的文藝圈子

蕭紅具有東北人的率真、豪爽，來香港時間不長，即融入了當地的文藝圈子。在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港分會假座大東酒店舉行的會員聚餐會上，她洋洋灑灑發言一個小時，報告重慶文藝界人士的艱苦生活、險惡環境，但是他們沒有放棄手中之筆，希望在香港人士珍惜和平局面，寫出更好的作品來。

一九四〇年四月，在《星島日報》「星座」主筆戴望舒的關照下，蕭紅、端木蕻良以「文協總會」會員身份，登記成為「香港文協分會」會員。五月十一日，遷港的嶺南大學學生舉辦文藝座談會，蕭紅應邀與會發言，「蕭紅先生演說頗長」(《嶺南週報》)。五月十二日，出席「黃自紀念音樂欣賞會」。

八月三日下午，「香港文協分會」紀念魯迅六十周年冥誕大會，在加路連山孔聖堂舉行，三百多人與會。許地山致開會詞後，蕭紅作魯迅生平事跡報告，長虹歌詠團獻唱。晚上，舉行內容豐富多彩的文藝演出，節目有田漢的話劇《阿Q正傳》、蕭紅執筆的一幕四場默劇《民族魂魯迅》(劇本後於十月二十日至三十一日的《大公報》文藝副刊連載)。

文藝晚會上，蕭紅十分活躍。她身穿黑絲絨旗袍，渾身散發出東方女性的韻味。蕭紅朗誦魯迅的雜文，給朋友們的印象是歷久彌新的：「瘦卻卻的，發音不高，但朗誦得疾徐頓挫有致。」(徐遲語)

長眠香港是她生命的最終歸宿

蕭紅火化後，端木蕻良將骨灰裝入兩個花瓶，一隻埋在瀕臨大海、風光旖旎的淺水灣邊，一隻埋在聖士提反女校校園後山坡上的一棵小樹下。一九五七年，淺水灣邊的蕭紅墓，遷葬廣州郊區燕嶺路銀河公墓。聖士提反女校後山坡上的蕭紅骨灰瓶，端木多次託人尋找，都沒有結果。

「時間久遠，山上樹木茂密，根本無法辨認。」「山前前幾年已被校方翻耕整過，沒有什麼發現。」

——香港大學盧瓊鑾教授給端木覆信說。

一九五五年三月，香港城市大學校長夫人、英國人蘇珊娜·浩女士郵寄給端木聖士提反女校上世紀四十年代地形複製件。請他指認當年埋葬骨灰瓶的確切地點，但是複製件模糊不清，當事人竟無法辨認。

一九九六年十月，端木蕻良辭世前立下遺言：將其部分骨灰灑在聖士提反女校後山坡蕭紅另一半骨灰埋葬地。一九九七年，端木夫人鍾耀群女士飛赴香港，幫助丈夫實現了生前遺願。在香港創作了一生三部長篇中兩部的蕭紅，以她往日夢寐以求的「寫作佳境」——香港——作了她的長眠之地。

陶潛詩云：「親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足道，托體同山阿。」(《輓歌》之三)後兩句意為：人死了還有什麼好說的呢？他的肉體與靈魂已經同山脈融為一體。可以這麼說：蕭紅是以一種獨特的方式屬於香港的。

蕭紅：屬於香港

黃元



(資料圖片)

民國四大才女之一的蕭紅，其生命如劃過天際的流星，僅只短短三十二年。追蹤其生命軌跡：二十四年在哈爾濱，三年半在上海(包括在青島、去日本一年多)

，兩年在漢口、臨汾、西安與重慶，兩年在香港。但就其與各地區的關係、在居住地的文學活動而言，她無疑屬於香港。這裡是她夢寐以求的寫作佳境。

一九三九年底，重慶遭日機頻繁轟炸。蕭紅體弱多病，經不住每天跑警報鑽防空洞。被王明撤掉《新華日報》總編職務的華崗建議：「你們還是到香港避一避吧！」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七日，蕭紅與丈夫端木蕻良，乘機飛抵香港九龍啟德機場。溫煦的南國海風令人心情舒暢；難懂的粵語，夾雜其中的大不列顛語言，提醒他們：到了英屬殖民地。

在孫寒冰的安排下，他們住進九龍尖沙咀金巴厘道諾士佛台街三號(後搬至樂道八號二樓大時代書局)。甫一住下，戴望舒便駕車來接他們去他和穆麗娟的住處林泉居參觀。戴望舒與蕭紅夫婦交一年，一見如故。

次日，葉靈鳳主持的《立報》副刊《言林》在「文化情報」上發了消息：「端木蕻良蕭紅昨日由內地來港暫住九龍。」接着，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港分會在大東酒店舉行會員聚餐會，歡迎蕭紅端木來港。翌日《立報》報道：「……到會員四十餘人，由林欽平主持……九時散會。」

蕭紅十分滿意在香港的一切，給在渝的好友白朗寫信說：「這裡的一切景物都是那麼恬靜和幽美，有山，有樹，有漫山遍野的鮮花和婉轉的鳥語，更有澎湃泛白的海潮。面對着碧澄的海水，常會使人神醉的，這一切，不都正是我往日所夢想的寫作佳境嗎？」

香港兩年是她文學創作巔峰期

幽美的寫作環境，激發了蕭紅噴薄的寫作熱情。她到港後的第一部作品《後花園》，四月十日至二十五日在《大公報》副刊「文藝」上連載。一九四〇年，是蕭紅的「筆桿年」、「生命年」；香港兩年，是其創作的巔峰期，茅盾欣喜地說「紅姑娘創作甚為努力」。她一生三部長篇中的兩部——《呼蘭河傳》與《馬伯樂》——就是在香港完成的。可以說香港參與了蕭紅文學作品的最後創作。

蕭紅與香港文藝界，其實是深有淵源的。一九三九年二月，戴望舒致信蕭紅、端木蕻良，邀請他們為他主持的《星島日報》「星座」副刊撰稿。蕭紅發表

在「星座」上的第一部作品是《曠野的呼喚》，四月十七日至五月七日刊發。後來，她又陸續給戴望舒寄去《記憶中的魯迅先生》等多篇文章發表。

《呼蘭河傳》——一部充滿自傳色彩、瀰漫着對童年往事及故鄉思緒的作品，「一篇敘事詩」、「一幅多彩的風土畫」、「一串悽婉的歌謡」(茅盾語)——是蕭紅全部著作中的扛鼎之作，一九四〇年九月一日起在《星島日報》「星座」六九三號連載。蕭紅邊寫邊送報社發表，至十二月二十日完稿，十二月二十七日連載完畢。香港《亞洲週刊》曾對二十世紀一百年中文小說進行評選，列出一百強排行榜，《呼蘭河傳》位居第九。

《馬伯樂》第一部完成於一九四〇年八、九月間，大時代書局初版。第二部從一九四一年二月出版的《時代批評》半月刊第六十二期開始連載。寫作《馬伯樂》第二部，蕭紅是硬撐着病體工作的。截至第九章斷稿，十一月十六日，《時代批評》第四卷八十三期刊登蕭紅委託袁大鈞代發的啓事：「啓：蕭紅女士的長篇《馬伯樂》，因患肺病，未能續寫，自本期起暫停刊載。」

《馬伯樂》第一部完成於一九四〇年八、